

主编 张柏然 许

译学新论丛书

gene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he cl-

pirates but wa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In

of his life, he was the colony's anti-slave chief ju-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n

Increase Mather, Increase Mather, the most pro-

digy of Puritan New England, was only fifteen

when he graduated in 1638. His mother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d out of

self during church services. He taught school

and preached at twenty-four. At twenty-

five, he became a Congregationalist minis-

ter, and at twenty-eight he was elected to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ily pre-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

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

Yale at his expense. Mather was offered Yale,

clined in favor of the more liberal Harvard. How-

ever, on one occasion, when the venerable

College delegates came up to him with the

"necessity," he wrote in 1724, after the great flood,

A more appealing prodigy was Nathan Hale in

1854. As a child from Litchfield, Vermont, he succeeded

in a "frightful calculator" that

evening in 1854, he was admitted to the

Sciences. At the time of his admission, he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H059

55

2006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

俞佳乐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俞佳乐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5327-4096-X

I. 翻... II. 俞... III. 翻译—社会性—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478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

俞佳乐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50 册

ISBN 7-5327-4096-X/H·746

定价: 2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总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 1989 年与 1993 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 20 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 20 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 3 位之外,其余 17 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 20 位代表人物被列入 6 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 5 个流派都是近 50 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 20 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6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19

引言	/21
第一节 语言：世界交流的中介	/27
第二节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从信息传递到语言接触	/35
第三节 翻译：人在“对话行为”中的社会运作	/41
结语	/49

第二章 翻译的文艺社会学观 /55

引言	/57
第一节 文艺：历史审美的创造	/62
第二节 翻译的社会机制：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70
第三节 翻译：在“创造性叛逆”中迎来新生	/80
结语	/89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	/93
引言	/95
第一节 文化:人类实践的财富	/100
第二节 翻译的文化语境:翻译史实的有力辩护	/107
第三节 翻译:构筑文化交流的桥梁	/116
结语	/126
第四章 归化与异化	/131
引言	/133
第一节 归化—异化:意译—直译的延续发展	/136
第二节 文化主流之“度”:求同还是存异	/149
第三节 翻译:追求“平等对话”的交往行为	/159
结语	/168

目 录

第五章 译者地位与翻译职业	/173
引言	/175
第一节 译者的命运：从“奴仆”到“主人”	/179
第二节 译者的身份：在“主体间性”中发挥“主体性”	/190
第三节 翻译：争取承认尊重的职业	/201
结语	/209
第六章 建设翻译的“科学场”	/213
引言	/215
第一节 批判与反思：科学的社会应用	/218
第二节 科学场理论：翻译生产的游戏规则	/226
第三节 建设“翻译学场”：翻译学的必由之路	/233
结语	/245
总结	/251
参考文献	/269

绪 论

当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入 21 世纪,科学探索和人文精神从抵牾走向沟通,东西方文化由冲突转为融会,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凸显。作为研究翻译的独立学科,翻译学正是在这种时代性的学术氛围内孕育诞生并且茁壮成长起来。与此同时,我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翻译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仅仅被看作是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要把握其各个层次,廓清其全部规律,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指出,译论研究不仅要探讨翻译的内部规律,还应该整理其外部关系。换言之,要使翻译学这门边缘性学科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成果。因此,翻译学应该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致力于汲取它们的前沿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实践进行多维的、交叉的、综合的探讨,以便揭示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联系。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新兴科学门类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适应了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进步的需要,翻译学当然也不例外。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特征,理论研究流派繁多,探讨课题范围广阔,高度重视人文需求。因此,在 19 世纪之后,以哲学观念为主的人文科学领域涌现出了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在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时,社会学同样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纵观中西方学术界数十年来的翻译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尽管各种翻译理论精彩纷呈,但就其讨论重点而言,翻译探索之路大致经历的还是从语言学向文艺学、又向文化学的转向,翻译研究也相应地分为语言翻译学、文艺翻译学和文化翻译学等主要流派。因此,在本书的前三章中,我们将会以翻译的社会语言观、文艺社会学观和文化社会学观作为切入点,对翻译的社会属性进行宏观的论述。

翻译的根本使命是克服语言文字的差异,达到思想文化的交流。从其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翻译面对的是语言形式上的转换。可见,翻译首先

是一种语言的活动,要想对翻译过程做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以加深对语言系统的了解,从总体上解释语言的功能为己任,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到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以及卡特福德、雅格布森和尤金·奈达等翻译学者们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翻译进行的阐述,无不涉及翻译活动的语言层面,其理论成果为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客观生活告诉我们,语言本身还是一种社会事实,语言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的功用便是满足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进行交流的需要。作为一种语用模式,作为社会生活中语言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活动并非独立于社会,而是服务于社会,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根本无法忽略其社会性的一面。概括而言,社会语言学的宗旨在于综合地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与翻译学一样,社会语言学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长期以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法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当今法国译坛也把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进行翻译探讨作为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借鉴社会语言学理论来观照译论研究,将十分有助于我们突破将翻译活动定性为单纯的语言行为的樊篱,从而揭示出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活动的社会层面。因此,在本书第一章《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中,我们会首先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情况进行追溯,以便了解语言的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国翻译理论家莫里斯·贝尔尼埃的社会语言学观点和让·皮特斯对于“介入理论”(la théorie de la médiation)的借鉴,就翻译活动中的信息传递和社会运作等问题展开探讨。

在《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①一书中,莫里斯·贝尔尼埃将发送主

^① PERGNIER, Maurice, *Les fondements sociolinguist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78.

体(l'émetteur)、发送客体(l'objet)、接收人(le destinataire)以及发送媒介(le vecteur)这四个“信息参量”的概念引入到对翻译过程的探究之中,通过分析翻译中的信息传递,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特殊地位进行了阐释。贝尔尼埃还就语言在交际中的双重作用展开了论述,揭示了语言对翻译产生阻碍的根源在于社会所制定的语言特性,但通过翻译达成的语言接触的积极作用却启发我们进一步推断出语言的社会本质:多种多样的语言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的滋养之下产生的,因此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社会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语言的差异,使语言之间产生隔阂,若要使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就必须消除这种隔阂。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活动的终极使命并非两门语言的转换,而是两种社会文化的交流。

《异的介入——翻译的一种社会语言观》^①是一部利用社会语言学前沿成果来对翻译活动进行探讨的新作。法国社会学家让·加涅班的“介入理论”将人类的整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人类具有使用语言表达和写作等特殊功能的原因。虽然“介入理论”并非针对翻译研究而设,翻译理论家让·皮特斯却合理地指出,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现象,翻译活动理应被包括在对于社会运行的整体研究之中。根据加涅班的社会学探索,人类的特性是具有四个相互区分而又平行共进的功能:通过言语表达意义;使用工具改造世界;建构社会关系;确定行为规范。皮特斯认为,如果将这种功能划分应用于翻译活动,我们会看到,翻译行为也包括语言运作、技术运作、社会运作和规范运作四个层面。正是由于人类建立起了具有特定结构的社会关系,语言从此有了你我之分,言语交流中便无

^① PEETERS, Jean, *La médiation de l'étranger—une sociolinguistique de la traduction*, Arras,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1999.

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解断层的问题,翻译行为则是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可见,翻译活动存在的理据并非来自语言的差异,而是根源于它的社会属性,翻译的可行性基础也不在于语言符号的表达能力,而是取决于人们建构社会关系、进行人际交流的能力。因此,在对翻译活动的分析中,社会运作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翻译活动以语言转换为表面形式,但这种转换的达成绝不是去机械地追求公式化的等值或平衡,相信凡是从事过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翻译活动强调语言的创造功能,讲究译文的艺术效果,是一门需要投入心智和情感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体现的艺术实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拓展延伸,人类对于艺术活动的研究视野和认识能力也得到了开阔和提高。在翻译实践蓬勃发展势头的带动下,“翻译文学”呼之欲出,翻译事业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其产业化操作也逐渐明朗,而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财富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引发了翻译作品从题材内容到体裁形式的总体变迁,不仅造就了翻译行为方式手段的不断发展,也使得社会环境对翻译行为的功能效应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鉴于翻译艺术与社会实践这种息息相关、割扯不断的联系,从文艺社会学出发,对颇具创造性的翻译艺术进行社会性的研究,也许即将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本书的第二章《翻译的文艺社会学观》中,我们会首先对文艺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研究内容作简要介绍,从而了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并借鉴文艺社会学中关于文艺社会过程的解析,对包括翻译生产、传播和鉴赏这一系列环节的翻译的社会机制进行阐述,还将结合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的理论来探讨翻译行为的社会特性。